

#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中国经济中的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

.13

韦文秀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中国经济中的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

韩文秀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KANBUJIAN DE SHOU” YU “KANDEJIAN DE SHOU”

——中国经济中的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

韩文秀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76号 邮编: 350001)

福州方盛印务有限公司激光照排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晋安区塔头路2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8.25 印张 2 插页 195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211-03117-4  
F·160 定价: 1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 第一章 从“看不见的手”到“看得见的手”： 源远流长的理论与实践 (1)

---

- 一、“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从亚当·斯密  
到凯恩斯 (1)
  - 二、“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从马克思  
到邓小平 (6)
  - 三、从“看不见的手”一手遮天到引入“看得见的手”  
——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实践 (12)
  - 四、从“看得见的手”一手遮天到引入“看不见的手”  
——中国经济的运行实践 (15)
  - 五、市场或政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7)
- 

## 第二章 市场机制魔力何在 (22)

---

- 一、经济学家如何赞美市场机制 (22)
  - 二、市场机制四要素 (25)
  - 三、多姿多彩的市场经济模式 (31)
- 

## 第三章 市场经济主体：主人和“奴隶” (42)

---

- 一、市场经济主体：作为生产者 (43)
- 二、市场经济主体：作为收入分配者 (48)
- 三、市场经济主体：作为消费者 (53)

四、市场经济主体：作为投资者	(59)
五、市场经济主体：作为储蓄者	(63)
<hr/>	
第四章 市场体系	(66)
<hr/>	
一、市场体系的结构	(66)
二、消费品市场	(67)
三、生产资料市场	(69)
四、资本市场	(73)
五、劳动力市场	(77)
六、技术市场	(82)
七、黑市和灰市	(85)
八、经济市场化程度	(90)
<hr/>	
第五章 市场不是万能的	(98)
<hr/>	
一、外部性：被动吸烟照样危害深远	(98)
二、公共物品：市场唱不了主角	(100)
三、垄断：市场不应成为少数人为所欲为的天堂	(103)
四、经济周期波动：坐过山车是什么滋味	(106)
五、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居民收入差距	(110)
六、盲目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	(114)
<hr/>	
第六章 宏观调控目标：鱼和熊掌	(118)
<hr/>	
一、经济增长：要挤干“水分”	(118)
二、通货膨胀：不能以偏盖全	(121)
三、充分就业：遥远的梦	(125)
四、国际收支平衡：不能越雷池一步	(127)
五、结构优化：不是多管闲事	(129)

六、宏观调控目标之间的关系：和谐与冲突	(131)
<b>第七章 宏观调控的运作：技术和艺术</b>	<b>(146)</b>
一、把握形势是前提：不当算命先生，要当老中医	(146)
二、时机：趁热打铁	(154)
三、力度：“软着陆”与“硬着陆”	(157)
四、手段：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164)
五、范围：不能有漏网之鱼	(169)
<b>第八章 宏观调控中的政府：导演与主演</b>	<b>(172)</b>
一、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72)
二、计划、财政和金融：三驾马车与三角关系	(175)
三、政府经济管理机构设置：大胆的设置	(198)
<b>第九章 政府也不是万能的</b>	<b>(202)</b>
一、政府缺陷：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	(202)
二、政府缺陷：作为宏观调控者的先天不足与后天不足	(206)
三、扬长避短：实现政府自身的超越	(210)
四、投资宏观调控：政府失灵的个案分析	(212)
<b>第十章 中国市场经济大趋势和 宏观调控新挑战</b>	<b>(232)</b>
一、我国已经告别短缺经济，正在形成买方市场	(232)
二、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份正在形成 三足鼎立局面	(234)
三、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可能由过去的“退一、平二、	

- “进三”转变为“退一、退二、进三” (237)
- 四、我国处于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隐性失业向显性失业转化的重要时期 (239)
- 五、我国消费结构处于由低层次消费向高层次消费  
转变的重要过渡时期 (242)
- 六、我国处于轻工业化已经完成阶段性使命，  
新一轮重工业化尚未启动的时期 (244)
- 七、我国进出口贸易正处于以数量扩张为主  
到以质量取胜的阶段性转换时期 (246)
- 八、我国处于主导产业缺位、潜在的新经济增长点多、  
现实而有广泛影响的新经济增长点少的时期 (249)
- 九、我国经济正在由大起大落的增长方式转变为  
相对平稳的快速增长 (251)
- 十、宏观调控面临新挑战 (253)

# 第一章 从“看不见的手”到“看得见的手”：源远流长的理论与实践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有两只神奇的手在发挥作用。一只是“无形的手”，那就是市场机制，一只是“有形的手”，这就是政府调节。过去，有一种极端的看法，认为这两只手是水火不容的冤家，并且分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两只手其实是搭档，是伙伴，可以和平共处于同一个世界。这里首先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考察一下这两只“手”及其关系的来龙去脉。

## 一、“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

###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

“看不见的手”是时下人们谈论经济问题时的一个时髦用语。“看不见的手”一词的发明权无可争议地属于18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其影响深远的巨著《国富论》(1776)中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倍加推崇。在他看来，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几乎无所不能。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个人在经济活动中



“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是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处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可见，亚当·斯密的思想用几年前曾经引起争论的一句话说，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社会）”，而且越是主观为自己，越能够更好地达到“客观为他人（社会）”的目的。

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最初是从经济活动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角度提出来的，可以引申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因此不难理解，亚当·斯密极力反对经济活动中的国家干预。他说：“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个人处在他当地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简言之，在亚当·斯密看来，国家干预私人经济活动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极为有害的。

那么，国家应当发挥什么作用呢？亚当·斯密认为有三条：“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总而言之，国防、治安或社会秩序以及私人

无利可图的公共事业或公共工程，才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职责。

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思想家，亚当·斯密关于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的思想是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最早的、完整的、具有经典意义的表述。这些思想显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时代的产物。

亚当·斯密于1723年生于苏格兰，14岁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后又到牛津大学学习，然后长期在大学教书。他自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一书后，开始被列为英国第一流学者。1764~1766年，他曾陪同他的学生贝克莱公爵到法国这个当时最先进的欧洲国家旅游，并造访过著名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此外，斯密曾长期居住在英国最发达的工业区之一的格拉斯哥，这使他有条件深入观察和思考工业革命从萌芽到蓬勃展开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生产力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对于英国资产阶级来说，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成了压倒竞争对手、扫除封建残余、发展对外贸易、扩大殖民帝国的最有力的武器。亚当·斯密的学说恰恰适应了正在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

有趣的是，似乎西方国家很早也有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国富论》出版两年后，亚当·斯密被任命为苏格兰爱丁堡海关税务司长。此后，他就再没有什么更大的思想贡献了。当然，通过出版《国富论》一书，他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对亚当·斯密的评价可能是有道理的。他说：“《国富论》众多的优点并不能解释它为什么会以后一个世纪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实际上，上升的资产阶级当时需要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发言人。亚当·斯密向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要求的理论。同样重要的是，他的自由放任理论能满足他们的自尊心和道德观。这一理论告诉曼彻斯特的商人，只要照顾好自己的企业，就是在按照上帝的意旨办事，

同时也为一国贡献了力量。”

在亚当·斯密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西方经济学的基调仍是阐释和赞美“看不见的手”，赞美市场机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著名的“萨伊定律”就是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该定律的基本含义是：供给能为自己创造出需求。这实际上把市场机制的作用无限扩大了。按照该定律，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的现象都是暂时现象，普遍的生产过剩是不可能发生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一定是相等的。马克思曾对萨伊定律做过深刻的批判，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特别是本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的大萧条，则给以往人们普遍信奉的经济学教条即“市场万能”以毁灭性的打击。

一旦新的经济思想成为时代需要，新的经济思想便会应运而生，这就是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他曾经在著名的剑桥大学学习和任教，曾任英国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据说还是炒股票的高手。他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为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凯恩斯革命直接“革”的是他自己的老师马歇尔的“命”。因为在凯恩斯之前，英美国家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学说，正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马歇尔从“均衡价格理论”出发，把资本主义经济描述成一部可以自行调节、自动均衡的美妙机器，这部机器不仅可以自行解决一时的失调，而且还可使社会各种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使每个人得到最大满足。1929~1933年的大危机，使这一神话遭到破灭。

凯恩斯经济学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开了国家干预主义的先河。他认为，“萨伊定律”是错误的。由于人们消费的增加赶不上收入的增加（消费倾向递减），由于人们为了投机活动而总想把一部分货币保留在手里（所谓“流动性偏好”），致使利息率提高，同时由于资本家对利润率的预期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降低（所谓资本

边际效率下降),以上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他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经常存在的,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是一种“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出的药方是引入“看得见的手”,实行一系列的国家调节或国家干预,重心是“管理有效需求”,目标是刺激消费,刺激投资,提高“资本边际效率”。其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当经济衰退时,政府应扩大开支,实行减税,甚至搞赤字预算,发行公债,以扩大总需求;在经济高涨时,则采取相反的措施,即缩减政府开支和增加税收,以减少总需求。货币政策用以配合、支持财政政策,主要内容是:当经济衰退时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息率,以刺激私人投资,扩大总需求;而在经济高涨时,则减少货币发行,提高利息率,抑制私人投资,减少总需求。在凯恩斯经济学中,财政政策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政策,处于主导地位,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则往往不如财政政策,因而处于从属、次要地位。

关于实行国家干预的主张,凯恩斯在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其实只有简短的几段话。他认为,在当时(30年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投资量是没有计划的,没有统制的”,“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量,让资本的边际效率逐渐下降,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他在全书的结语一章中说:“有几件事情,现在操之于私人之手者,将由国家集中管理;但是还有许多活动不受影响。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统揽;……可以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强烈理由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把社会上大部分经济活动包罗在政府权限以内。要紧的倒不是生产工具国有;

只要国家能够决定（a）资源之用于增加生产工具者，其总额应为若干；（b）持有此种资源者，其基本报酬应为若干，则国家已尽其职责。”

凯恩斯完成了对传统经济学的革命，从此以后，国家干预的合理性、必要性获得了理论依据，“看得见的手”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西方经济生活的舞台，与“看不见的手”一起成为调节经济运行、配置经济资源不可或缺的两类基本手段。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从“看不见的手”到“看得见的手”，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竖起了两块里程碑。亚当·斯密和凯恩斯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的学说所以产生了广泛的、深远的社会影响，除了他们的学说中的确包含了一些独到的真知灼见之外，恐怕更重要的是因为时代的需要，因为历史处于特定的转折点上。

## 二、“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

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设想，大概可以说是一种精致的、组织得十分完善的计划经济或产品经济。如果可以把计划调节也归类为一种“看得见的手”，那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中，似乎全社会经济运行都应当置于这支“看得见的手”的支配之下。

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中有一段有名的话，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曾经用反问的口气说：“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

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在许多人看来，这些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将实行计划经济的主要依据。但客观地讲，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并没有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组织方式进行全面、系统的“设计”，而是在不同的场合，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弊端的批评过程中，对未来社会合理的经济体制或经济组织方式顺带描述一下。现在回过头来看，许多问题值得再思考。显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设计出一个完整的、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详细方案是过分的，不现实的。另一方面，如果把经典作家多少年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方式的片言只语当作万世不变的教条，也是很危险的。不幸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完全的计划经济真的被当成了不容置疑的教条。

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现实主义者。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有明显的区别。十月革命前，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实质）是，把土地、工厂等等即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全社会的财产，取消资本主义生产，按照总的计划进行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生产”，“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是一致的。到了1921年，在十月革命刚刚取得胜利的时候，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认识到完全取消商品交换是不现实的，因而果断地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商品交换，即用“社会工厂生产的产品”，来交换农民手中的粮食。允许农民将余粮拿到市场上出售。他说，“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性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因为新经济政策容许建设

中的社会主义同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在通过市场来满足千百万农民需要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竞赛。”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允许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不过，即使列宁本人也可能认为新经济政策不过是权宜之计，而不是常态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或政策范式，因为列宁曾经说过：“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一定会变成社会主义的俄罗斯”。那么，在列宁心目中，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如何组织生产、调节经济呢？由于列宁过早去世，我们不得而知。新经济政策引入市场机制也许只当作“创可贴”，用它只是为了应急，一旦经济有所恢复就把它揭掉。但似乎可以大胆推测的是，如果列宁不过早辞世，那么在列宁的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中可能持续地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形成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到了斯大林的晚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他正式承认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合理性。斯大林的推理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两种公有制形式，即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由于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转让出去，愿意以农产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其他商品，所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仍有必要存在。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对外贸易中的生产资料则是商品），只有个人消费品才是商品。现在回过头来看，可以说这种推理是脆弱的、牵强的，只承认消费品领域里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这里给我们的印象是：在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作为工具，市场机制（商品生产和交换）就像非嫡系部队或杂牌军，而计划则是嫡系部队或正规军。杂牌军固然有用，但不能委以重任。过分倚重非嫡系部队或让非嫡系部队来驻防要地，还可能招致“政变”之祸。既然是这样一种态度，那么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得不到正常发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东欧国家的经济学家曾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进行了大量富有创见的探索。这些经济学家主要有波兰的奥斯卡·兰格、布鲁斯，捷克的奥塔·锡克和匈牙利的科尔奈，但他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理论层面上。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经济学家都来自于东欧小国，他们的思想主要是在本国的经济改革实践中有所反映而已。

兰格的思想可称为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他认为在一系列假设前提下（例如，平均成本最小的投入组合、以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来决定产量、居民自由选择消费品和职业、积累率由计划当局决定等），可以利用大量数据和方程式，运用类似竞争市场的“试错法”来模拟市场，使社会主义经济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兰格模式的理论色彩远胜于其实践性。

布鲁斯把经济决策分为三个层次：(a) 基本的宏观经济决策；(b) 局部（部门或企业）决策；(c) 家庭或个人经济活动决策。进而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划分为四种：一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即 a、b、c 均集中化决策；二是集权模式，即 a、b 集中化决策，c 原则上分散化决策；三是分权模式，即 a 集中化，b、c 分散化；四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即 a、b、c 均分散化。在布鲁斯看来，分权模式较为理想，并认为匈牙利实行的正是这种经济模式。

奥塔·锡克提出要走既不同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又不同于苏联集权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即民主的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必须有有调节的市场机制。国家要制定国民经济分配计划，由企业生产集体来承担资本经营的责任，从而使劳动者真正同企业一体化。

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几十年中，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这样那样的探索，主要做法是下放经济决策权和引入市场机制，这些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实践中也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但这些探索最终以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政治和社会剧变而告终结，画上了一个不够圆满的句号。

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中国一枝独秀，引人注目。改革前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从来没有达到苏联那样高度集中的程度。可以说，市场机制在中国从来不曾铲除净尽。城乡集市贸易曾经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多次试图割除，但结果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因此，在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中引入市场机制，就显得十分自然、容易。改革以后，人们可能惊奇地发现，中国本来就是适合市场经济的一片沃土，只不过过去不允许撒播市场经济的种子，不允许开放市场经济之花而已。

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显得那么朴实无华，甚至有些土气，但这可能正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智慧所在，是大智若愚的一个范例。

中国的改革是相当彻底的，具有革命意义。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调节作用。这个规定性表明，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至此已达到极致，因为在当今世界，市场机制已不可能，也不应该发挥比基础性作用更大的作用，即使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是如此。因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比基础性威力更大的作用，只能理解为由市场机制决定一切，即完全自由放任，而这种情况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在任何国家的经济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

中国之所以最终走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把“看不见的手”请进来，并赋予其如此重要的地位，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早在 1979 年，邓小平就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